

一九六八年德國學生運動始末（下）

郭石城

（續上篇）

三、學運瓦解的過程

（一）抗議無效，學運成員鳥獸散

一九六八年五月三十日聯邦議會通過「緊急狀態法」，隨即於六月底生效。「國會外反對黨」的抗議完全沒有效果，參加抗議的群眾難掩失望的情緒，他們開始懷疑這個組織的功能，已逐漸有人退出反對活動，雖然靠學運團體的支撐，勉強辦了一些零星的示威活動，但是聲勢已大不如前。而且學運團體本身組織原本就很鬆散，而成員又極為複雜，沒有持久的計畫和嚴密的組織，學運的瓦解只是遲早的事。

（二）小聯合內閣的致命吸引力

一九六九年社會民主黨與自由民主黨共同組織小聯合內閣，布蘭德總理在施政報告中宣稱，聯邦政府敢於嘗試給予人民更多的民主，並答應進行各種內政改革，改善與東歐鄰國及東德的關係。在經歷一九六六年的經濟危機及學運帶來的不安之後，布蘭德總理的施政報告給人民帶來了新希望，也吸引了一大部分學運的核心人物重新回到體制的正軌，加速了學運團體的瓦解。

（三）學運成員的流向

一九七〇年三月學運團體SDS2正式宣告解體，它的成員分別流入下列三處：（1）主張改革的人寄望於社民黨與自民黨政府。因此，一部份人加入社民黨和它的外圍組織，一部份人加入自民黨；（2）認為政府改革有限的人則深入基層，日後成為所謂「新社會運動」的主力，最後在八十年代初期成立綠黨；（3）左傾的學運份子一部份加入德國共產黨（Deutsche Kommunistische Partei，簡稱DKP），其餘的人則各自成立許許多多小團體（即所謂Sponti），彼此對立。學運後期領導人物柯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和費雪（Joschka Fischer）所屬的「革命鬥爭」（Revolutionä）就是這種所謂Sponti的小團體。它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創立的，最先打算在歐寶（Opel）汽車廠爭取勞工，後來知難而退，轉而在法蘭克福市霸佔空屋以及阻止法蘭克福機場擴建。他們使用的策略包括：遊走法律邊緣，有限度使用暴力、與媒體建立良好的關係等等，後來都被「新社會運動」的公民自發組織廣泛運用。這個團體的成員經過時間的蛻變，後來都回到現實政治體制，在體制內追求改革。

另外，還有一支人數極少、採取暴力手段的恐怖組織，這就是一九七〇年五月成立的所謂「赤軍聯」（Rote Armee Fraktion，簡稱RAF）。

「赤軍聯」在七十年代中期至末期採取暴力手段謀殺他們憎恨的政治和資本主義體系下的代表人物，如：聯邦檢查總長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銀行家蓬托（Jürgen Ponto）和海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雇主聯合會主席施萊耶爾（Hanns-Marfin Schleyer），以顛覆聯邦的政治和社會秩序。雖然這是學運團體瓦解多年的事，但是，「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學運是始作俑者，無法辭其咎。柯恩本迪說得好：「我們應該對這個可悲的結果負道義上的責任，因為正是由於我們混亂而矛盾的烏托邦思想，才使得這些人走火入魔。」

四、德國朝野的反應

德國的學運是從一九六五年西柏林的一次抗議行動開始的。一九六七年蔓延到全德國，一九六八年在全世界學潮蕩漾之際到最高潮，餘波影響直到如今。

一九六八年學運究竟是一場革命或僅僅是一場動亂？學運領袖之中最有領導能力和最有智慧的杜切克（Rudi Dutschke）和克拉爾（Hans-Jürgen Krahl）便認為這場學運有可能演變為革命，很可惜錯過了機會。後期學運領袖柯恩本迪和費雪也有類似的看法。當年參加過學運的人都有高估學運成就的傾向，他們著書立說吹捧一九六八年是覺醒和解放的一年，它促使德國的現代化跨出了一大步，在德國歷史上只有一八四八年差堪比擬，他們將一八四八年革命的那群人為「四八人」，並標榜自己這一代參加學運的人為「六八人」。

（一）學運為何不能引起大眾的共鳴？

學運份子的確有高估學運成就之嫌，實際上，學運一開始就註定無法成功，因為它不能引起廣大民眾的共鳴：

第一、戰後德國政治穩定，經濟繁榮，人民生活安定，正是國泰民安的昇平時代。學運的發生並不是因為聯邦德國發生了政治或經濟上的危機，而是經濟繁榮帶來了不少社會問題，他們對政府各大政黨沒有改革的意願或者沒有能力解決問題相當失望，因而採取了抗議行動。可是學運的影響範圍僅及於年輕一代的知識份子。廣大的勞工已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而一般民眾剛從戰後艱辛重建中恢復過來，好不容易過著安定的日子，自然也不希望社會動亂，沒有廣大民眾的支持，自然無法演變為一場革命。

第二、學運抗議的主題也引不起人民的興趣。越南戰爭與第三世界的解放與德國何干？德國的安全需要美國的保護，更何況戰後受惠於美國者多，盲目反美，徒增外交紛擾，亦非大多數人民之所願。學運份子不分青紅皂白魯莽的追究上一代附和納粹的責任，造成嚴重的世代衝突，也引起人民極大的反感。

第三、學運份子懷疑現行的政治制度，對現存的傳統、權威、禮教、世俗、觀念和習慣都採取批判的態度。他們的出發點也許是善良的，但是他們熱情多於理智，空想多於實際，輕蔑多於莊敬。表現於外的言行以也予人以憤世嫉俗，不講道理的印象。他們主張的性解放，帶來的是色情氾濫，反權威教育帶來的是青少年吸毒及學校暴力事件的增加等等，一般人都將這種社會秩序的瓦解、道德及價值觀念的淪落現象一股腦兒都歸咎給學運。

第四、學運不可能演變為革命的另一個因素是：聯邦德國有一套保護民主的機制，如基本法第十八條和第二十條第二款的規定，根據的是下面這個原則，即：「妨害自由者不得擁有自由」。聯邦德國政府根據這個原則於一九七二年一月公佈一項法令，禁止敵視憲法的激進份子從事公務。這項法令雖然引起許多爭端，但對當時動亂的社會還是發揮了相當程度的作用。又如一九七七年聯邦政府成立危機處理中心，由聯邦總理主持，以對付從事顛覆活動的恐怖份子。

（二）德國知識份子的評價

以下是一般大眾對學運的評價，知識份子則特別強調下面幾點：

（1）「浪漫式的倒退」

根據學運份子的說法，聯邦德國必須有一個自己真正需要的民主制度。一九四九年開始實施的民主制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勝國強加於德國的結果，一九六八年以前德國實行的只是形式上的民主，學運結束以後，人民才爭取到大量的參與機會，因此可以說一九六八年是聯邦德國的民主再造年。學運份子最重要的主張是：廢除代議民主制度，實施全面參與政治的機制。對學運採取負面評價的人則認為聯邦德國的民主政治已經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基本法的代議民主制度已經實施了二十年，而且成效卓著，現在要把它全盤推翻，聯邦德國的政治和社會秩序豈不是要天下大亂？難怪當年與學運份子針鋒相對的西柏林自由大學政治學教授羅文塔（Richard Löwenthal）將學運的主張形容為「浪漫的倒退」（Romantischer Rückfall），讓人民能夠全面參與政治固然理想，但實施起來卻是困難重重，學運份子的設想未免太天真，太浪漫了。

學運份子最授人以柄的是他們言行不一，他們口口聲聲服膺民主政治，但在實際政治活動上，卻一點也不民主。當他們與對手發生爭論時，根本不遵守民主規則，操縱他們主導的集會，安排附和者阻撓對手發言。對立場不同者則口誅筆伐。甚至對一向同情學運的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稍有不同的意見便激烈反駁，對主張溫和改革的自由主義者更是不假辭色。

（2）「四五人」已經開始著手改革

學運份子標榜他們這一代為「六八人」以凸顯學運世代在德國歷史上的地位，很多人都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對聯邦德國貢獻最大的應該是：經歷一九四五年這段歷史而成長的世代，我們不妨稱之為「四五人」。這批在二十年代初期至三十年代初期出生的這一代，在納粹統治時期度過童年或青少年，在戰後廢墟中成長，並在戰後國家最艱難的時期參加重建工作，積極參與政治，努力建立公民社會。在社會大眾保持緘默的五十年代，正是這些知識份子不斷提醒大家千萬不要忘記追究納粹的罪行。根據德國社會學家達倫道夫（Ralf Dahrendorf）在1961年發表的一篇「德國的社會與民主」報告指出，這些佔人口結構多數的社會中間份子思想活潑新穎而且能夠適應新的潮流，他們在五十年代中末期至六十年代初期逐漸孕育了改革的觀念。及至六十年代中期，越戰的升高喚起他們對戰爭恐懼的回憶，經濟不穩定及對國際市場的依賴也使他們產生危機意識，就在這種氣氛帶動下，主張改革的社民黨與自民黨終於能在一九六九年大選中執政。如果不瞭解這一點，便很難理解為什麼只是一批人數不多的激進青年學生能夠在一九六七—一九六八年帶動那麼大的風潮。如果不是因為當時已有改革的氣氛，立場比較公正的大眾媒體不可能提供

學生運動那麼多表演舞台；如果不是因為學者、新聞記者、政治人物經常討論學運帶來的問題，學生運動也不可能產生那麼大的影響。

大聯合內閣司法部長海內曼（Gustav Heinemann）的司法改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海內曼就任司法部長之初，德國有很多不合情理的法規，例如：根據當時的親屬法，非婚生子女在法律上毫無地位，沒有繼承權，父母任何一方對非婚生子女也沒有監護權，監護權屬於青少年保護局，直到一九六七年在海內曼的努力下，才制訂新法律保護非婚生子女。又例如：當時的刑法嚴禁成年男女同性戀，父母親如果讓成年子女留宿未婚夫或未婚妻，若被人檢舉，也會被處罰，罪名是誘人通姦。這些舊的法律規定都是製造社會不安的溫床，因為伴隨這些規定而來的是親屬、鄰居間的告密、恐嚇、勒索、虛偽等卑劣的行為，直到1969年這些陋法才被廢除。「國家不得隨便闖入人民的臥室」（Der Staat hat in den Schlafzimmer seiner Bürger nichts zu suchen.）的原則才得以貫徹。

當時國家透過刑法管制的不只是人民的私生活，也包括人民的政治活動。由於東德共產政權的威脅，聯邦德國在五十年代制訂一套保護國家的刑法。凡是信奉共產主義者都受到聯邦政府的特別注意，他的一隻腳已經踏進了監牢。閱讀東德的機關刊物「新德國」都可能被刑求，因為它是「危害國家」的報刊。這些規定都在一九六八年陸續被廢除。

所有這些改革都在大聯合內閣期間（1966-1969）實現，強調一九六八年學運之後才開始改革的人，未免太高估了學運的重要性。實際情況應該是：政府致力推動改革，學運則是反映大眾的心聲，在旁邊敲邊鼓，在裡應外合的情況下衝破保守勢力的藩籬，達成了改革的目標。

（3）「書本上學來的革命」

學運世代的致命傷是：他們有理想，可是不切實際，很多時候都顯得口是心非。他們崇信馬克思主義，卻對蘇俄及中國的共產政權實施馬克思主義的缺失視而不見。一九六八年八月蘇聯鎮壓「布拉格之春」，學運份子並沒有採取相當的聲援行動；他們歌頌中國大陸的文革，卻看不清文革背後權力鬥爭的本質。他們無視於戰後近二十年聯邦德國在政治和經濟上的成就，一口咬定聯邦德國的資本主義制度一定會重回法西斯主義的老路。

一般人都把學運份子的幼稚歸因於當年盛行的凡事提出質疑的風氣，卻沒有豐富的知識來判斷是非，也沒有養成深思的習慣，無怪乎文學家格拉斯（Günter Grass）批判一九六八年的學運為：「從書本上學來的革命」（angelesene Revolution），政治學者施耐爾（Franz Scheider）則諷刺說：「充其量只是青春期的最高峰」（bestenfalls der Höhepunkt der Pubertät）。

（4）「無力哀悼」言過其實

德國心理學家米切利希所著「無力哀悼」這本書的主要論點是：在追究歷史責任的時候，德國人民難免捫心自問，當年納粹作威作福的時候，我不是也曾經搖旗吶喊嗎？當納粹在清算和屠殺猶太人的時候，我不是也曾經喝采叫好嗎？現在要完全否認和切割，是有違良心的事。唯一的辦法就是坦白承認，以贖罪的心情來面對。可是，這卻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於是有些人就推卸責任，說這是少數人犯下的罪過，而且已由這些人承擔；或者乾脆推說自己完全不知道納粹犯下的罪行。不過，絕大部分的人採取的方式是：重新再出發，積極參與戰後的重建工作，在忙碌的生活及自己描繪的遠景中驅散納粹及戰爭的夢魘，擺脫往事的糾纏，讓自己的心情能夠得到寄託。

這本書出版後，學運份子奉之為經典，德國知識份子則有不同的看法。批評者認為米切利希言過其實，有逃避心理的人固然不少，但那不是普遍存在的現象。戰後也不是沒有人提出歷史責任的追究問題，只是少數知識份子和政治菁英的呼籲沒有得到廣大民眾的響應。廣大民眾之所以沒有共鳴，實在也是因為他們戰後正在生存線上掙扎，說他們無暇顧及比較合理，說他們有意規避則毋寧太過。再說，德國戰敗後百廢待舉，需要安定，也亟需人材，不宜大規模追究責任。

五、學運的影響

將學運批評得一無是處也非持平之論。學運不論是一場革命或是一場動亂，它畢竟寫下了歷史的一頁，多多少少改變了德國。學運在政治上雖然失敗，但是在文化和社會上確有不可抹殺的貢獻。

（一）學運對德國人民行為和心態的影響

首先要提到的是學運及其後的新社會運動對德國人民行為及心態的衝擊。德國遲至一八七一年才建立民族國家，由於起步較晚，因此民族及國家意識非常強烈，民主自由思想長期受到壓抑。影響所及，一般德國人都輕視民主政治，崇信強權領導，嚴守紀律和秩序。聯邦德國建立初期，這種反民主自由的保守勢力仍然存在，雖然有不少知識份子提出警告，但是深受戰火浩劫的一代忙於生計，對政治漠不關心，而且他們已經習慣於接受現實的安排，認為這是他們作為國民應盡之義務，很少人會想到為自己爭取權益。到了六十年代末期，自由的政治氣候已經形成，人民對參與政治的態度轉趨積極，學運世代更進一

步以抗議和示威的方式，公開表達自己的立場。抗議和示威即難免與公權力發生衝突，予人以破壞法治與製造社會不安的口實。但是唯權利是從，即不可能有進步和改革。因為擁有權力的人永遠強調合法，一切民眾的訴求都應該透過合法的途徑，而法律是擁有權力的人制訂的，是維護他們自己權益的規定。在這種困難的情況下，學運世代逐漸在生活中摸索出一套戰略原則，那就是：（1）遊走法律邊緣；（2）有限度的衝突；（3）善用大眾媒體以博取民眾的同情。這切策略一方面表示，他們不放棄改革的要求，一方面顯示他們的自我克制。代表公權力的政府和一般社會大眾也展現了德國民主社會的包容性，在「異中求同」中接納了學運世代及新社會運動的一些改革建議。八十年代初期綠黨成立，學運世代及新社會運動成員盡入其中，他們擺脫了革命迷思，重新回到現實政治體制，在體制內追求改革的理想。經過這場動亂的洗禮，聯邦德國的民主政治顯得更為成熟。

（二）學運對「新社會運動」的影響

學運團體瓦解後，核心人物在政治上和社會上仍然積極活躍。根據一項調查，在120名核心人物之中，35%投入大眾媒體，25%在大學教書，15%從政。他們的職業生涯大部分都很順利，並在各自的工作單位上繼續追求改革的理想。根據另一項調查，1971年因學運瓦解而流散到全國各地的左翼小團體總共有250個，人數高達八萬四千人。這些人帶著他們在學運活動中獲得的經驗，踴躍參加七十年代初期在各地如雨後春筍般成立的公民自發組織（Bürgerinitiativen）。新社會運動的訴求大致可以歸納為下列三大類：（1）生態環境的保護；（2）社會改革；（3）基層民主；其中以社會

改革項目最多，包括：刑法自由化、婦女權益的保障、弱勢族羣的保護、改善都市人民的生活環境（如提供廉價住宅、抗議屋主長期空置房屋無人居住、改善交通工具、加強文化設施等等）。在這些訴求活動中，過去的學運成員都很積極活躍，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當年在學運團體嶄露頭角的婦女健將們，為婦女同胞爭取到許多權益，大大的提高了婦女的政治和社會地位。八十年代初期有人問對學運沒有好感的哲學家哈伯瑪斯，德國學運的最大成就在哪裡？他笑一笑回答說：「麗泰·聚施穆斯」，聚施穆斯（Rita Süsmuth）是德國第一位女性國會議長，是德國婦女政治地位提高的象徵人物。

此外，學運鼓勵人民勇於提出批評，積極參與政治，而且提出許多新的觀念，還有他們的生活方式等等逐漸滲透到社會各階層，不知不覺之間改變了德國社會文化的面貌。儘管有許多人認為這是時代潮流之所趨，不管有沒有學運，這些變化遲早會發生。但是，不容否認的是：學運衝



破了許多抵制的力量，是推動德國現代化及人民參與政治的一股清新的力量。

六、結語

「不要讓這場動亂白忙一場」

對學運評價之所以不容易公正，乃是因為高估者與低估者都有以偏概全的毛病，所見並不夠遠、不夠深。德國歷史學者格拉塞（Kermann Glasser）在「聯邦德國文化史」這本書中將一九六八年作為德國第三期政治與文化發展開始的一年。一九六八年的確是德國歷史上關鍵的一年，從這一年開始，國家的管制越來越少，而人民獲得的自由越來越多，參與政治的機會也越來越大，婦女的政治和社會地位也已經大為提高。一九六八年已經成為反對政府管制的年號，這個年號不是任何個人或團體所能獨佔，他是朝野共同努力的結果。在學運達到最高潮時，海內曼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他說：「不要讓這場動亂白忙一場」（Die Bewegtheit dieser Tage darf nicht ohne guten Gewinn bleiben.）。一方面期許自己繼續進行司法改革工作，另一方面也顯示他「成功不必在我」的恢弘氣度。學運份子如果能體會這句話的含意，就不會在乎由誰來領一九六八年的風騷了。

學運份子應該慶幸他們有一個寬容的民主社會和不少賢明如布蘭德、海內曼的政治人物，在他們徬徨無主的時候召喚和引導他們回到體制的正軌，在體制內繼續追求他們改革的理想。

（本文作者為德國海德堡大學博士，曾任僑選立法委員，現旅居德國）